

风险社会视域中的人性化思想政治教育

宇业力

[摘要] 风险已成为人们难以回避的现实境遇,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变化、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风险社会理论已成为人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并赋予其深刻的方法论意蕴。面对信任危机、价值选择的矛盾、思维方式变化的思想现实,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关注人的社会性存在、个体化生存、思维方式的跃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理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 风险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

[作者简介] 宇业力,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江苏 南京 210096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4)04- 0163 -05

当今,风险已成为人们难以回避的现实境遇,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变化和行选择。风险社会理论已成为人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并赋予其深刻的方法论意蕴。如何深刻领会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准确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理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风险社会的特征与社会风险的类型

现代社会风险是科技和制度发展的必然后果,是人为制造的。所以说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是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体现出风险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人为性。现代社会风险不同于传统社会源于自然灾害的“外部风险”,而是某种程度上由于人们不负责任的制度和决策导致的“人化”了的和“制度化”了的风险。起源于西欧的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是现代制度的核心,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充分体现在政治、专家和国家上。现代风险具有政治反思性,“在风险社会,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非政治性的事件变成了政治性事件。规避和管理风险也包括

了对权力和权威的重组”^[1](P34)]。这都体现了人为性特征。二是不确定性。风险社会是一个风险逻辑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这种风险逻辑主要表现出不确定性逻辑与安全危机逻辑。现代科技深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与此相关的后果与危险在全球化进程中让受害人无法直接感知、感觉。甚至生活在远离风险源的人们可能无时不在风险之中。在风险分配逻辑中,风险分配不因人的地位、身份而改变。正如贝克所说:“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2](P38)]人们生活在不确定性风险恐惧中,无法感知、确定风险是否逼近,风险类型怎样,风险结果如何。在不知不觉中,风险悄然降临。“正如贝克所言,风险的传递与运动经常是潜在的、内在的,使得任何专家对风险也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与预测,削弱了对知识和制度的权威,失去了对专家的‘系统信任’。”^[3](P119)]三是个体化。人为的不确定的风险存在,造成社会个体“存在性焦虑”,体现在人际关系层面是“信任危机”。安东尼·吉登斯指出:“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4](P8)]风险社会打破了人们生活中已有的经验、既成的惯例。风险意识

的树立、风险抵御能力的增强、风险后果的处理都高度突出人的个体性存在。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结构性特点是“个性化”,个体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个人生活中的机遇、威胁和矛盾等原来可以在家族和村社中或通过求助于社会阶级或社会团体而得以解决的问题必须越来越多地由个人自己来感知、解释和处理。”^{[5](P12)}本体性的安全感和诚信感成了个体行为的源头。风险社会中,人们做了什么,什么时候做事,将在反思性选择中不断地作出自主抉择,体现了人的鲜明个体化特征。

现代社会人们无论承认与否都生活在无法想象的不确定性风险中。风险是以不同形态存在的,表现出不同类型的风险。根据风险分布领域可将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根据风险来源可将风险划分为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制度风险、政策风险等。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失业风险。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深刻调整使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更加脆弱,大多数非熟练工人面临失业风险。失业社会风险不仅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风险,而且正成为中国面临的首要社会风险。人们基本的生存现实遭受严峻考验。二是生态风险。现代高科技发展,使人类技术与自然相互作用强烈而深刻。最先步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过度开发资源、破坏环境、消耗能量、征服自然的行径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人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不安和恐惧,以及对技术生态风险的焦虑与困惑,生态风险加剧人的生活恐惧心理。三是安全风险。风险社会里,个体不安全感和焦虑与日俱增,安全生产风险、危险化学品风险、交通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使人变得恐惧、敏感、焦虑、多疑,人们渴望基本安全需要、生存需要的满足。

二、风险社会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

风险社会的生成并深化发展,造成人们不确定性的社会情境、存在性焦虑和本体性安全威胁的生存境遇,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人的价值取向、信任体系和思维方式。

(一)价值取向的矛盾与偏差。具体表现为:

一是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矛盾与偏差。风险社会理论表明风险社会的社会性的性质与形式。因为现代社会风险不同于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外部自然风险,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是人

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自反性后果,体现出风险的社会化形式。风险的社会性加深了人的社会性存在与生成,彰显人的“类存在”维度。在高强度全球化风险构成全人类生存风险时,要规避、化解风险,就必须重新审视诸如种族的、民族的、阶级的、政治的边界,打破个体的、团体的、局部的利益藩篱,以人类共同利益和共享的价值观应对共同的风险境遇。突出强调人的类价值的存在意义和社会价值取向。然而,风险社会强化了人的个体化生存维度,风险承担者由集体转向个体。直接暴露于风险浪潮中的个体与社会关联更直接、更紧密。个体化进程实际上导致了个体与社会间一种新的直接性,社会问题直接表现为个体问题。为了化解风险、消除危机、摆脱焦虑,在难以寻找到社会、组织、集体保护网的时候,人们会强调个体判断、自主抉择、自我价值实现,放大自我。当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体价值超越了社会价值,寻找自我安全感、归属感,思想行为上出现自我的认同危机、选择的矛盾与偏差,削弱了理想信念。

二是功利价值与伦理价值的矛盾与偏差。风险社会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现代化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中国融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后工业化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于当今同一时空中,难免会出现突出强调经济发展量化指标的硬道理。工具理性凸显,功利价值占据价值评价的主导地位。追求科技创新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终极目标,而不顾及风险的发生与后果,以及科技发展的伦理价值。“今天中国各种技术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扩大再生产,主要是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同GDP主义的政策安排合谋的结果。”^[6]当人们享受着科技成果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生活便捷时,却遭受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等自然界的报复和有毒食品生产、核风险威胁、网络犯罪、人际冷漠等伦理危机。人们开始审视科技发展的人文价值、伦理价值。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科技的发展与运用应以人的生存、发展、幸福为终极目标。要克服极端的功利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的短视的功利价值判断标准。然而现实中一遇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解决温饱这些现实问题时,功利价值总是优于伦理价值,出现两者间选择上的矛盾与偏差。

(二)信任的危机与渴望。风险总是与信任相交织,具有人为性的社会风险造成中国传统信任体系的震动和现代信任的危机。风险的来源不是

无知,而是知识,不是过去对自然的顶礼膜拜,而是现在的掠夺破坏,也即人为性。更主要的是风险的制造者往往与政策制定者、科技工作者、变革决策者以及专家不无关系。在风险发生以及后果处理上,出现了政策制定者与专家结成的联盟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他们制造风险,然后建立一套话语体系来推卸责任,变成道德规范的违背者、责任伦理的缺失者,引起公众强烈的不信任,影响人们对教育中美好蓝图的信任与追求。

指向未来的不确定的社会风险降低了人们的信任度。他们担心诸如失业、安全等风险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否会哪天落到自己头顶。不是过去决定现在,而是未来的风险影响今天的抉择。人们在相信“未来更美好”的同时裹挟着“明天会怎样”的担忧。过去的经验、惯例难以成为推断未来发展的缘由,人们的生活、交往已不再限定于稳定的亲缘关系、血缘关系、业缘关系所构成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而是进入脱离具体地域情境的脱域时空,交往格局被打破。现代性、风险性瓦解了传统亲缘关系、社会关系、信任关系。时空脱域、不确定性降低了人们的社会信任度。

利益性是风险社会影响人们信任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信任关系以利益关系为基础,“信任是一种暗含的利益表达。就某一事情而言,说我信任你,意味着关于这一事情我有理由期望你为了我的利益行事……你的利益暗含着我的利益”^{[7](P24)}。风险的发生本质上就是利益的动力,都是利益的驱动使充满伦理道德的信任关系被利益、金钱、制度等社会抽象体系所取代。利益的追逐、风险的规避造成人们焦虑、急躁、抑郁、猜忌、多疑、恐惧、敏感、迷茫等心理和不轻易接受、容忍、信任的态度。对于政策制定者、专家由于可能从自身或自己所在群体的利益出发,而全然不顾及公众利益,更是遭到人们的不信任。因为他们收获利益,却让别人承担风险,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不匹配。风险致使信任危机,同时风险的威胁与人们对风险的恐惧又使人们渴望信任,希望在信任中找到共同价值观——公平、公正、正义、尊重。这就是信任的危机与渴望的矛盾。

(三)思维方式的变革与超越。现代社会风险的发展和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研究,深刻地影响、改变和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形成风险思维。表现为:一是风险的整体性思维。风险是现代性发展的结果。现代性,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因时空压缩使人类生活的地球直接变成了

“地球村”,风险社会就是全球风险社会。每一种类的风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把每一个人关联起来。核威胁、生态风险超越民族、国家、阶级边界而将人类连成整体,并相互作用。正如吉登斯认为的,由于脱域,在远距离上发生的过程和事件间有一个更高程度上的相互作用。世界风险社会提高了人们生存的整体维度,迫使人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处理问题的方法应具有整体性思维。价值选择上应具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的胸襟。不能只考虑个体、团体、局部,而不顾及他人、社会、整体,只管眼前、当下,不顾长远、未来,只看主要,否定次要。“依靠过去那种简单的抓主要矛盾的方法来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现实,必须让位于以整体性、非线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8]二是风险的个体化思维。风险社会增强了个体主体性和个体价值诉求。贝克认为,个体化“是人们要求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观念并且能够据以行动的权利”^{[2](P113)}。这就形成了人们处理问题、认识事物、对待人强调个体价值、地位、作用的个体化思维。要克服本体为寻求一个最高的、抽象的、没有任何规定的、永恒不变的“本体论”或“实体”时而形成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本体论思维方式在对待人、教育人时,强调人的先验、预成的本质存在。然而现实中,特别是风险社会里,人是生活性、生成性、发展性存在,个体化思维就是要承认个体的生活、幸福、利益、自由。三是风险的反思性思维。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以现代性危机为逻辑起点,通过反思性现代化的研究开创性地提出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与反思性现代化是同一个意思。吉登斯的风险思想及其风险社会理论同样是在对现代化批判与反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通过对知识的运用、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分裂和对立、现代工业文明副作用等方面的反思,展现一个反思现代性现象的“风险社会”,培育了风险的反思性思维。促使人们不断反思自己的思想行为、生产生活、科技创新、价值选择可能蕴藏的负面的风险后果,打破固守僵化、因循守旧的传统思维,改变将人单纯客体化、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实现反思思维中批判、创造、创新。四是风险的预见性思维。不确定性的风险是指向未来的,树立风险意识就是要现代社会对自己的决定可能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作出可预见性的判断与治理。对风险发生的原因能正确认识,对后果处理不盲目、被动、无措。尽量做到预见正确、措施有效,而不是事后诸葛亮。这要求人们具有风险的预见性思维,而不是

守成思维下的宿命论。

三、基于风险社会的人性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随着自然、传统的终结和惯例的消失,随之而来的是个体的迷惘与无助,生活失去确定性和方向感。教育对象思想行为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剥离人的生活境遇而孤立进行,必须赋予其对教育对象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关爱。

(一)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人的社会性存在。社会属性是人性基本要素之一。风险的社会化强化了人的社会性存在,人的现代社会性深化了风险社会的发展。人的独特思想根植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并与它们交织在一起,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回避社会、回避风险、回避生活而变得封闭、保守和独自为战。今天,只有面对风险社会,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因认识到人的思想行为形成的物质根源和社会根源而变得更有效、更真切、更人性。现代社会风险与人的决定、决策、制度密不可分,充分体现风险症候的人性根基。无论是从核危机到恐怖主义、从生态危机到环境恶化,还是从传染病肆虐到安全风险隐患、从社会信任危机到心理焦虑,都是如此。因此,贝克看到社会风险中人性所起的中心作用,而且努力从“人性”角度审视当代风险问题及其出路。这需要我们认识到,人的社会性生成与发展是人性化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重要条件和功能展示。要我们从风险社会反思性思维中,正确看待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凸显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意识、理论自觉。因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9](P6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人的社会性生活与实践寻找切入点,着眼于人类整体的利益、长远的幸福和持续的发展,而不是追求片面的个体价值、功利价值。谋求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和谐共生,避免人性化教育中对人性弱点的迁就和人性内涵的片面理解。

(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人的个体化生存。吉登斯从“本体性安全”和“存在性焦虑”的角度分析、解释社会风险时,充分表明风险体现出人的个性化的生存境遇。人时常会面临诸如失业风险、生

态风险、安全风险、金融风险等诸多社会风险的威胁。而且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困难、风险都不一样,以至于每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愿望、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结合每个人的实际状况和思想特点加以把握。具体而微,情真意切。如果人们的思想问题、实际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缺失了本真的人性关照、呵护和人格关爱、尊重,必然会给人们造成教育内容上的空话、套话、假话的感觉。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沿袭传统单调、统一的教育内容和说教式的教育方法,无视人们个体化的生存现实。教育者用代表一定社会或阶级需要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对教育对象进行教育,不管教育是否真实和有效。另一方面,当教育对象面临风险威胁、生活困境、心理恐惧时,却出现社会中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导致对教育者、教育内容的怀疑。因此,面对个体化生存现实,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关注。反思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人的主体性存在和个体化生存的事实。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以人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角度来加以考察,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的生存为根据,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以及对人的意义性存在的关注。因思想政治道德教化,才使人的生活、生命趋向至真、至善、至美,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一种需要和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而变得有价值、有意义。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同时,更要凸显出风险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关爱生命的呼唤,而不是任凭各种社会风险对人的肆虐。避免思想政治教育将社会看作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独立实体而遮蔽了人的个体化生存。

(三)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风险社会带来风险思维的变化,以人为教育对象的政治教育必须把握人的这种思维变化,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的转化:一是克服传统本体论思维局限,关注现代生成论思维的作用。本体论以探究万物本源、存在始基为己任,容易将人及其生活世界二重化,出现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相对与绝对分离状态与紧张关系。在此思维影响下,以客体化、对象化研究人,实际上是以物种方式抽象地研究人,突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可知、可塑、可控,以达到对人的统治目的。然而,人是有思想、有需求、有欲望的人,是生成、变化、发展的人。思想政治教育要真正达到教育目的,就要在人的广泛社会关

系和现实生活领域中认识人、把握人。不要指望在对人的本质作了某种超验的预成的假设后,单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知识的灌输,就会实现对人的思想的一劳永逸的把握。这是过去思想政治教育一个非常突出的弊端,完全不考虑当今社会风起云涌、世界政治多极变幻、人的生存境遇此起彼伏、人的思想跌宕起伏的社会现实,使得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二是克服守成性思维弊端,强调反思性思维的价值。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一味地突出其阶级性、政治性,就容易导致教育的守成与复制,缺少反思与创新。教育者习惯于一本书、一支笔、一张嘴、一套课件的说教,照本宣科,不接触实际,不搜集问题,循规蹈矩,墨守成规,害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性、政治性,害怕自己的理论不足以担当回答问题的重任,造成教育的低效甚或无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反思性思维就是要培育反思意识、批判意识。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足、针对性不强、现实性不够、人性化缺失、生活化不足、问题意识淡漠等的反思,赋予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气息与活力。当然,反思不是反动、破坏,而是充分发挥反思性思维的激励作用、创新作用,激励教育者对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有效性的深入研究。三是克服知识性思维的局限,重视价值性思维的作用。知识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制造风险。同样,教育对象的知识不等于教育对象的思想。以追求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作为最高目的而形成的知识性思维,通常强调知识的工具性评价标准,把教育对象当作灌输知识的容器。注重知识量的增加,以获取知识的多少作为评价尺度。忽视教育对象思想境界的提高和责任意识的培育。不考虑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忽视知识对人的生存、发展的效用(即价值),人被抽象为知识化身。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性思维就是要在风险社会的信任危机、存在性焦虑、自我认同危机等价值问题上提供科学、合理的价值立场、价值导向、价值选择,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而不是在非此即彼的对立不相融的思维中将两者孤立起来。要突出人的地位、作用和生命的意义,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利益诉求,始终将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价值。

(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构建合理的信任体系。针对信任的危机与缺失,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加强

信任教育和信任体系的构建。主要就是树立政府、组织的责任伦理意识。按照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相匹配的分配正义要求,防止“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发生,处理好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提高自身、自然、社会、他人以及子孙后代的伦理责任。对于已发生的风险,政府要有驾驭复杂局面、处理风险后果的能力,而不是遮蔽问题、逃避责任、掩盖矛盾、转嫁风险损失。这样才能提高政府公信力,打造出信用型政府。为了真正取信于民,获取公众的信任与理解,需要构建公众与政府、专家系统共通的话语平台、话语语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平等对话。在议事中交流,在议事中教育。在尊重人、关爱人中唤醒人的责任意识。信任不仅发生在个人与政府、组织间,同时发生在个体与自身、他人间。信任教育就是要求个体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在全社会营造人际间信任文化,在共享价值观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之间风险共担、价值共享、坦诚相待、相互信赖。使人在“陌生人社会”中不感到交往恐惧、信任焦虑、利益受损、伦理缺失,而是人与自身、他人、社会、自然间的和谐状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人性关爱的人本价值。

[参考文献]

- [1] 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2]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3] 贾英健.风险社会的人学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 [4] (德)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 [5] (德)乌尔里希·贝克.再造政治: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初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6] 肖瑛.风险社会与中国[J].探索与争鸣,2012,(4).
- [7] (美)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M].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 [8] 白玉民,王子平.关于思维方式若干问题的思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陈梅云]